



沈卫威 著

回眸“学衡派”

——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



人民文学出版社





猫头鹰学术文丛

回眸“学衡派”

——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

沈卫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沈卫威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4
(猫头鹰学术文丛)
ISBN 7-02-002852-7

I . 回… II . 沈… III . 学衡派 - 研究 IV .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085 号

责任 编辑: 一 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3.80 元



沈卫威，1962年生，河南省内乡县人。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兼任研究生处副处长，1994年晋升为教授。主要著作有《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致读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世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代表；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指称。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企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自 序

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写一本书的愿望已有几年了。当 1996 年 11 月着手这一工作时，才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一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知识语境和他们自身学识的专业化程度的高深、广博，从知识谱系上去接近他们，的确有些为难。二是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反现代化思潮的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西方反现代化思想同中有异，其特殊性和变异性又非任何一元的理论所能统摄。欧美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由内在的思想、科学的变革，进入现代化时代，随之产生了反现代化，乃至“后现代”思潮。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在外力的冲击下，回应西方，向现代化迈出的最初步伐。文化保守主义者反“现代化”的理性，与西方反“现代化”，乃至“后现代”思潮，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从思想谱系上去考察，就面临着理论上的多元性。三是就“反对派”而言，如林纾、章士钊、辜鸿铭、梁氏父子、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数不少，且各为派系，起初设计的对他们进行一种史论的概述，却因对象的丰富、复杂，而难以运作。于是，我

缩小范围，将研究对象具体化、个案化，并选取一种适合自己学术操作的角度和行文方式，着重讨论“学衡派”。

“学衡派”文人群体的成员很多，我着重选取了梅光迪、胡先骕、吴宓这三位代表人物，作个体分析。梅光迪的材料影印自胡适档案中保存下来的书信，并首次标点、注解；吴宓的材料主要是取自他的日记；胡先骕的诗文则是由张锡智先生（胡先骕任中正大学校长时的学生）提供的。

在纷繁复杂的时代，思想和价值观念不可能是绝对的一元，因此，批评本身也就必须有多元的视角和方法。思想和方法可能随时代的变迁而过时，但基本的历史实事却是不变的存在。这本关于“学衡派”的书，引述了大量的基本史料，三位核心人物，也只是选取某些方面的材料，尤其侧重引述他们反抗新文化的话语霸权，瓦解新文学理论的个体话语，以及蕴含道德主义的知识权力的言辞。另外两位人物：柳诒徵、汤用彤，前者的专门史著述，后者的佛学研究，都是极富学术个性的工作。作为“学衡派”的成员，他们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没有梅、胡、吴那样敌对（汤用彤后来成了胡适的好友）。他们的学术变成了精细的学术专业操作，没有那些在专业领域以外的理论反抗和富有颠覆性的话语，使得其作为学术工作相对游离于这种“敌对关系”，故不作专章讨论。

本书的文体，是一种历史叙事，而不是缜密的理性分析，对人物的描述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梳理上。对三位主要人物的描述方式、角度也不相同。其中对吴宓的认识和叙述，基本上是录用他的私人话语，我只对其中的内在矛盾、冲突加以结构化的二重调适，别人论说过的地方，不在这里触及。

此书完稿只是这项工作的一个小结，特写此片言。
是为序。

目录

自序 (1)

第一章 “学衡派”的人文景观

——倾斜的学术天平 (1)
一 激进与保守的内在紧张 (1)
二 《学衡》杂志的基本过程与宗旨 (7)
三 留美学子与前《学衡》 (15)
四 刘伯明·东南大学·《学衡》 (17)
五 吴宓·清华学校(大学)·《学衡》 (23)
六 中华书局·《学衡》 (31)
七 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衡》 (36)
八 《学衡》作者群 (43)
九 《学衡》主要作者的个体命运 (52)
十 《学衡》对新文学革命的批判与清算 (62)
十一 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 (76)

第二章 梅光迪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态度

——早期书信解读 (83)
一 壮志未酬身先卒 (83)
二 尊孔与为祖国辩护 (86)
三 立志修身之道与社会关怀 (93)
四 悲观情绪与心理变态是走向保守的内在因素 (99)

五	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	(108)
六	把胡适“逼上梁山”	(114)
七	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认同	(125)
八	加盟《学衡》与反对新文化运动	(133)

第三章 植物学家胡先骕的人文情怀

——	早期诗文解读	(147)
	引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追求	(147)

上篇：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一	批评《尝试集》	(153)
二	首先引介白璧德思想到中国	(158)
三	批评家的责任	(162)
四	批评实践的两个极向	(166)
五	文学的标准问题	(170)
六	保守、偏至的历史起点	(183)
七	三民主义文学的倡导	(188)
八	旧体诗词的创作	(192)

下篇：教育改革与思想文化的重建

一	留学生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195)
二	师范、党治、教会与中国教育	(202)
三	赣省教育、博士考试及大学生人生观	(206)
四	改造与重建	(211)

第四章 吴宓的志业理想与人生悲剧

——前期日记解读……… (222)

上篇：志业与职业

一 父子冲突与诗人理想……… (223)

二 有志于报业……… (227)

三 对新文学革命的极端仇视……… (231)

四 文学与报业的双重企求……… (237)

下篇：人文主义理想与浪漫情怀

一 意乱情迷……… (241)

二 内在冲突……… (243)

三 爱情理想的虚无……… (246)

四 虚伪的人文主义者……… (252)

五 感情生活上的浪漫主义者……… (256)

六 难以界说的新旧差异……… (263)

第五章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极端取向

——自杀的文化意义……… (271)

一 梁济自沉……… (272)

二 王国维投湖……… (278)

第一章 “学衡派”的人文景观

——倾斜的学术天平

一 激进与保守的内在紧张

1

在对“俄化派”的共产主义者茅盾和“西化派”的自由主义者胡适进行个案考察之后，我把视角转向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衡派”，即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建立在一种文化比较视野上的相关的学术活动。在学术研究的具体运作中，我追求一种内在的支援和互见。这三者共同处在一个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震荡之中，既有彼此的关联和相互作用，更有十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多元的互为制衡。

任何一种思潮的形成和传播，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支援，身处其中的文化人，必然负载着一定的文化使命，自我身份的显示和文化意义的理性承担，都使他们在思想、学术，乃至文学艺术的发散时，表现出自身的意义守护。每一种主义，在形成和发散的具体过程中，都有规范自己理性的道

统，信奉和坚持，既是文化人的意识显示，又是其思想的意义蕴涵。

新文化运动带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激进，其思想背景和外在的思想资源是欧美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思潮。启蒙运动是与传统相对立的。其手段就是理智，目标是个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传统。这种启蒙意识发散到科学、艺术和公共生活的多个方面，并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空间。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科学主义思潮则对人的精神加以更为理性的规范。E·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强调：“科学主义与传统是敌对的，因为它只承认被认为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规则，而这些知识又与科学程序和理性分析密不可分。那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实质性传统应该被取代。”^①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都信奉科学主义的威力，具有十足的科学功利主义色彩的实验主义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是敌对的。这时，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非理性化的倾向，即道德热情：道德化的谴责、批判和道德化的维护、坚守。在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激进主义者推崇个性和现实的体验；保守主义在对想象中的过去的依恋中，企图重建过去文化形态的精神家园，或寄希望于新旧、中西的调和。

^① 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第 31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从思想史上为激进与保守这两个观念性问题提出了一个解说：“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①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内部危机和外在冲击下，一直取向于激进变革之途。中学与西学、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对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倡导者，多把传统文化当成现代化的最大敌人。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学衡》坚守中国文化的道统，以保守主义的姿态出现，他们面对的是整个激进的时代大潮。而《学衡》派文人的思想师承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白璧德认为世界所有伟大的古典文化传统已经受到来自思想上的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的威胁。他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人生态度的高度。认为“古典的”代表历史的审美、伦理标准，以及个人精神生活的“内省”，它象征着秩序和组织；而“浪漫的”则代表着所有标准的丧失，个人感情和集体生活的失控。从新文化运动始，持保守主义的林纾、章士钊、章太炎、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以及《学衡》派的主要人物，在皇权解体和“帝国儒学”失落

^①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之后，几乎没有政治上的企图和作为，他们没有对旧政体的重现抱乐观态度，他们所表现出的只是反映民族感情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那种极力维护现行政治秩序的保守主义几乎无涉。这种过分珍视过去传统的理念和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心理上所显示出的主要也是集体的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和身份的归属感。他们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制约和批评，也主要是从这方面进行的。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是以三位一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三者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的。本杰明·史华慈认为这三个范畴共生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它是在一个共同的观念框架中运作的，而这些观念产生于欧洲历史的特定时期。^① 保守主义作为激进的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同时也是启蒙时代（“理性时代”）某种倾向的“辩证的反动”。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趋势，是要寻找人类困境和罪恶的根源，改变个人生存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从思想上确立新的路向，以解决现实问题。行为中的乐观色彩和社会文化批判中的偏至，同时也给保守主义以可反动的余地。在 20 世纪的中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难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帝制和复辟都无法成功），其民族主义的成分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并以文化的守成作为与激进主义相对抗的阵地。所以，当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林纾希望借助和呼唤的政治上的“伟丈夫”也不可能出现。

^① 本杰明·史华慈：《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 150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1915—1923年）的历史行进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直作为激进的新文化思潮的反对力量存在。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从学理上抗拒“新青年派”文化激进主义思想的是“学衡派”。二者交锋的场地主要是文学，并由此发散到人生信仰、学者精神、学术研究，以及整个新文化思潮。

《学衡》创刊于1922年1月。此时正是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新潮》文化激进主义文人群体分化，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全面获胜，且由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白话文成为中小学课书面语言之后。尤其是新文学已进入创作的实际收获季节，且新文化阵营中的一部分人，由思想文化上的激进，迈出了政治上激进的新步伐，《新青年》迁回上海，成为勃兴的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刊物。因此，胡适在这年（1922年）3月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长文时，针对《学衡》的“学骂”^①写道：“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②他还进一步指出：“《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

^① 《胡适的日记》上册（1922年2月4日记）第258页上说，“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胡适同时在这天的日记上写有打油诗，讥讽《学衡》是“一本《学骂》”。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胡适作品集》第8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47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反对党已破产了。”^① 胡适不屑于回击“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攻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几句话。

《学衡》是作为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反对势力出现的，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主潮中，只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行之流，在强大的时代主潮冲击下，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并未形成一股有碍历史大变局的力量，只可算作时代之波中的几朵浪花。但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它有自己学理上的价值。在 20 世纪世界反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中国的“学衡派”（且是以留学欧美归来的学人为主体）属于“新保守主义”（哈贝马斯将西方的保守主义分为“老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青年〈激进〉保守主义”——抑或称“后现代主义”），它有别于试图搞专制复辟和做着帝制梦想的政治保守主义（“老保守主义”），其主要表现是文化上的保守，而无政治上的企图。作为世界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它受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表现出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某些倾向。它是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民主、自由，如刘伯明所主张的“共和精神”，“自由必与负责任合”）、经济（科学时代的赐予）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承继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本章着重从史上展示《学衡》的基本过程和

^① 《胡适作品集》第 8 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 149 页。